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四 十 一)

（采访者注：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是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学理论的典型，林

耀华是该理论小组组长，后来还当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本文是对他的采访笔录。但未经其本人审核。）

文革前我是复旦附中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六七届高中）。复旦附中是上海的重点中学。我在班上成绩可算数一数二，唯一的愿望就是考大学。我喜欢数学、物理、化学，成绩相当好，语文成绩也不错。高中时学校让选修课程，我便选修了古文，因此我的文言文功底很扎实，古文不用注释就能读通看懂。这为我以后的理论小组经历打下了基础。

我父亲是职员。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时不算好，但也不算坏。父亲希望子女都能读大学，而我们都实践着父亲的心愿。还没上小学，我便已识了许多字，亲戚朋友来家时，父亲最骄傲的就是拿出认字的方卡片让我当场识辨。我生性要强，从小学到中学，成绩总是第一名。我什么都喜欢争第一名，落在别人后面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记得上中学时，评三好学生必须门门功课都是班级第一；有一年，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平均分数每门九十九点三，但仍不是第一名，没被评上三好学生，我为此哭了一场。这种处处要强不甘落在人后的性格，既是我以后人生道路上的动力，但也蕴伏着危机。

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读书梦，我被分配进上海最大的钢铁厂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二车间当了一名浇钢工人。不过比起那些上山下乡的同龄人我还算是幸运的。我们厂有二万名工人，我所在的车间是特种钢车间，有着当时远东第一流的设备和产品。浇钢工的工作很艰苦，即使大热天，必须穿着厚帆布工作服，里面不能穿汗衫短裤，防止灼热的钢渣溅进内衣落不出来烫伤皮肤。我并不十分在乎工作的艰苦，年轻健壮的体魄，从小所受要艰苦奋斗的教育，使我将这一切看作是对自己必要的磨炼；我苦恼的是自小的理想破灭了。在学校，衡量学生的标尺是学习成绩，我的好胜心与我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是平衡的；但进了工厂，我的优势无法体现，工厂衡量人的标准是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我虽年轻力壮，工作认真，但钢的产质量却不一定是佼佼者，而且文革中衡量人还有其他标准如出身等。此外，在内心深处，我也并不甘于永远作一个重复着简单劳动的操作工人。大学梦始终在我心底隐现。在一群受教育不多的工人中，只有知识才是我的优势，也只有知识才是我真正的追求。但恰恰正是知识，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首要革命对象。

我的许多同龄朋友们沉浸在打牌和抽烟之中，而我却一头扎进了毛泽东及马克思、列宁及斯大林的著作中。我当时住在厂区宿舍，同宿舍里还住着几个“革命左派”，车间的党政干部经常来找他们串门，这种环境根本不能看其他书，哪怕看西方经典文学名著也会遭到汇报或批评。所以我只能看“革命领袖”的著作。我也喜欢看这些书，虽然阅读并不轻松，但我希望能在这些书中寻找与知识连接的桥梁，我这个人大概天生对政治感兴趣，还在初中时便在家翻看父亲的《社会主义教育阅读文选》，看得津津有味。

一九七四年是转折点。批林彪联系孔孟之道，报上登出《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文件上也摘了许多孔孟语录供大批判。但许多人包括车间负责政宣和大批判的干部看不懂这些文言文。过去，我们车间也有大批判小组，批判刘少奇。但形式很简单，只需将刘少奇的话与毛主席的语录对照一下，毛主席怎么说的，刘少奇怎么说的，然后加上几句批判话，一篇文章就写成了。而这次，许多人连读都读不通文件中的文言文。那一天，正是我的夜班休息日，车间学习小组的负责人（复员军人）来找我，说车间党支部无法传达中央文件，党支部书记连念都无法念成句。他要我去厂里，说你是老三届高中生，古文底子好，可以帮车间党支部对中央文件进行翻译和解释。

我去了车间，先由我对文件作解释，再由各工段党支部向班组宣读，当时我是

二车间的团总支书记，车间中心学习小组成员，我们这个小组共六人，组长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复员军人，兼车间政宣组组长，我是组员。我们的宣讲就象学校语文教研组备课，对难懂的文言文一个字一个词地解释。厂里为中央文件的宣讲专门搭起了大字报栏，贴满各车间的批判文章和漫画。

我们厂的动态很快被上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市革会当即派人来厂了解情况，座谈会上有个工人说了句“工人阶级是理论的主力军”，马上被作为“工人语言”登上报纸。不久，《解放日报》社派了个老记者来我厂，在厂里待了一段时间。他带来好多剪报：外地的、上海的，都是批林批孔方面的，包括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孔孟之道与林彪黑话选批之类的东西。他希望我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也能搞出一份类似的东西。他定下格式：先孔孟的原文或原话，然后以白话文解释这些话，再写林彪是怎么看的，最后写工人是怎么看的，就这样，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搞了一份《〈论语〉选批》。三个人合写：我写十条，另外两人各写五条，我统一修改，将语言通俗化、工人化。这二十篇东西都被《解放日报》刊登，整整一版，影响很大。市委副书记、市委写作班负责人徐景贤也来我厂开座谈会，徐问我们发表时用什么名义，我答“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徐景贤说：这样好，不要去用什么“工人理论队伍”。（当时许多厂的文章署名是“工人理论队伍”）“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就这样成了以后一个时期内的著名组织。

我是浇钢工段的工人，文章能刊登，浇钢工段党支部很骄傲。于是，我们车间另一个材料工段的党支部也组织工人批孔，让老工人批《三字经》。《三字经》是老工人从家里带来的线装本，很漂亮。文章写成后由我修改，署名仍是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文章发表后也一炮打响，听说江青很欣赏。以后，其他地方也学着我们，把那些流传于民间的老古董如《女儿经》、《神童诗》翻出来批。

我们写的《〈论语〉选批》《人民日报》也转载了，不过被按形势需要作了很大修改。以后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

支部领导这样起劲，真正的动机是为了显示自己抓阶级斗争有方。文革中的干部如果只抓生产，充其量只是生产型干部。当时我们厂抓生产的干部，不是“留用”的文革前干部，就是政治上没希望被提拔者，造反派是不屑于抓生产的。生产上的成绩必须和政治联系起来，即“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车间党总支书记升到厂部当厂党委书记去了，车间党总支正需要接班人。谁来填补这个空缺？材料工段批《三字经》的文章见报后，这个工段的党支部书记便升任车间党总支书记，因为他抓革命有方。他原是社会青年，六十年代修过海塘，文革前夕进工厂。而我也在一九七四年底当上了车间党总支副书记。我们两个都因抓革命得到了好处。

我在党总支内兼任宣传委员，专门分管理论小组。不过，在理论小组，我仍是普通的组员。

工人理论队伍由以下几类人员组成：

(一)因身体不好或年岁较大而被照顾上常日班的老工人。他们干活没定额指标，干完活没事了，便可以出来参加理论队伍的活动。

(二)“大跃进”时期及六十年代进厂的工人，当时各行各业支援“钢铁元帅”，一批小生产者、自由职业者也进了钢铁厂。我们工段里有个连环画画家，以前是自由职业者，靠稿费生活，后来为有个铁饭碗进了工厂。文革中被叫去专画大批判专栏，绝对专业水平；还有个作家，曾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之一，后来到我们工段搬炉砖；另一个原红专学校的教师，字写得极漂亮，专门抄写大字报。这些人都成了工人理论队伍成员，因为他们有文化。

(三)文革前进厂的中学毕业生，这些人文革中大多是造反派，以后成为工宣队队

员。

(四)复员军人，其中有些原来在部队就是当文书的，还有一些因当时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被部队精简的军官，这些复员军人也都有一定文化。

(五)文革中从学校毕业的“老三届”，他们是工人理论队伍的骨干。他们文革初期是红卫兵，进工厂后对政治的热情没有消退，工人理论队伍满足了他们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个人的才能、爱好在文革单调划一的环境中得不到发挥，如有的人喜欢写作，有的人喜欢历史，却无处投稿，没有书看，现在有了机会。我们车间有工人理论小组成员，宣讲儒法斗争史时，声色俱茂，表情生动，简直象说书，这人爱好表演艺术，利用宣讲满足自己的表演欲。

老三届为什么会被重用？我认为这是由于老三届进厂时文革高潮已过去，他们因此与文革所造成的各种恩怨是非没有瓜葛，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造反派个人素质差，工作态度差，为老工人看不惯；而老三届进厂时便被告知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们大多干活认真，尊重老工人，因此与老工人关系较好。而又由于他们是工厂的文革高潮后进厂的，没参与过对工厂干部的批斗，因此与干部的关系也较好。这些干部被“解放”恢复权力后，便启用老三届学生而冷落造反派：上面说干部结构要“老、中、青三结合”，那些干部便将老三届学生作为“青”的代表（造反派因此说这是老干部排斥造反派的手法，“以青代新”，即以提拔青年工人代替对被称为“新干部”的造反派的提拔）。

而我与造反派关系也较好，因为当初我也是红卫兵中的造反派，有共同语言。刚进厂时，我曾提出我们青年不但要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还要接受路线斗争教育，造反派听了很高兴，给我们讲厂文革史。（不过，我对造反派也有过不恭：刚进厂时，正好遇上“整党建党”，我曾贴过造反派的大字报说“非党员怎么可以审议党员能否恢复组织生活？”）

我怎么会一下成为理论小组骨干？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我自己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是我所在的党总支书记的培养。我那时是车间团总支书记，与党总支书记一个办公室，党总支研究什么工作我都参加。党总支书记过去是报童，没受过教育，也不懂生产，但很尊重知识，对政治很敏感，人缘关系也好。他很会抓形势，很会把各种人安排到适合的岗位。他重视我，对其他团干部也很重视，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受过教育，是批林批孔主将。因此我们车间各工段的团支部书记都成了理论队伍的骨干。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厂党委书记带我去康平路向市委汇报工作，当时的几个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王秀珍以及徐景贤都在。厂党委书记讲完之后，我汇报二车间理论小组的工作，徐景贤问厂党委书记：“人怎么还没定？”王秀珍指着我说我很年轻，徐景贤说：“就这样定了。”回厂路上，在轿车里，党委书记告诉我，决定让我去北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会。当时因毛主席说要读法家著作，准备八月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会，而且要工人参加注释，市委把上海的工人名额给了我们厂。我们厂起初送了一名炉前工，还送了一位驻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工宣队连长，批生物学家谈家桢的。厂里起初不愿送我，怕我被上面看中留下不回厂了。但那两个候选人上面都没有看中，这才又送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要我去康平路很可能是相面，看看我的口齿和思路是否清楚。与我去北京的还有天津六号门码头的一名码头工人，天津小靳庄的一位民兵连长等。我和当时闻名一时的广州中山大学历史教授杨荣国是领导小组的成员。

当时为什么会挑中我？我想，一方面，因为我是高中生，古文功底好；另一方面，在同时进厂的工人中，我干活的态度也最好。而且，我的家庭出身在当时虽不算好，但也还算可以。和我一起的青年中，有一个家庭出身是小业主，还有一个家庭出身是工商地主，自然就选了我。此外，我们厂是万人大厂，专炼军事用钢，我

所在的浇钢工段又最能代表炼钢工人的形象。而从主观上说，我自己把评法批儒当成了一门学问，以为这就是学习与研究。就这样，我被作为御用工具，作为政治运动中的石头。

参加这个会议，使我从工厂走向社会，又走向中央，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我到外地去，如承德，人家把我看成中央人物，向我要经费；我在上海因为与市委写作班子接触较多，人家也把我看成通天人物，向我打探“中央精神”。会议结束后回上海，我当了上海评法批儒领导小组的成员，具体负责历代法家著作的选注，由市总工会牵头，计划出四册，后只出了三册“四人帮”就垮台了，没再出第四册。

我是“历代法家著作选注组”的负责人，由我组织一批老先生如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阳宽等以及其他工农兵代表选择和注释历代法家著作。注释每篇文章我都安排三个小组写，看哪篇最好，再综合定稿。然后由教授们审稿，看有无差错，最后由我定稿。

教授们非常有学问，对我很客气，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我的大学梦得到了补偿。我觉得自己是在做研究，当别的同龄人都在上山下乡或在工厂当工人时，我却与这些著名的教授在一起讨论学问，这是我的幸运。我同这些教授们讨论问题时从来不以我的工人身份压他们，希望能平等待人，他们对我的一些学术处理也很尊重。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别人在文化革命中失去了很多，我却在这时学到了许多知识，得到了许多。

一九七五年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作为上钢五厂的工人代表参加。其实，厂里原定的四届人大代表是一个紧跟陈敢峰的造反派。陈敢峰文革初期是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的造反派头头，后来当了市革委会委员。林彪事件后，陈因和林彪集团中的王维国关系密切而失宠，这个工人代表也被换了下来。另一个被换上去的造反派当时正在为自己家造房子，被邻居告发说他用公家的材料、在工作时间、叫工厂的工人免费为他干活，告状信到了市委副书记王秀珍手里，王秀珍便将其撸了下来，这才换了我。因为此时上钢五厂的知名人士排下来就是我了。前面的两个候选代表原来内定为主席团成员，换了我，便正式当了四届人大主席团的成员。据说当时邓小平的政治报告中有一句“工人理论队伍正在扩大”，也是我进主席团的原因。

四届人大以后，我再也不能在市里搞法家著作注释了。厂里说我是作为工人代表而参加四届人大的，不再回厂，就没资格代表工人了，一定要我回厂。于是我又回到车间，重新担任车间党总支副书记和浇钢工段党支部书记。我不想永远在工厂当基层干部，我渴望读书，希望搞学问，只有学问才是我真正的乐趣和归宿。但是不行，厂党委说我如果要上大学当工农兵大学生，必须经市委副书记马天水批准。市委写作班子党史组要调我，团市委要调我，厂党委都不肯放。他们认为这是培养我。但是文革结束后，在厂里我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我辉煌了三年，以后则要为这三年付出十年甚至可能是整个后半生的代价。

我又回厂当基层干部，抓政治学习，当然也要抓生产。但此时的我已是名人，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我被作为政治道具，每逢政治波折或运动，都要让我表态亮相：评《水浒》、批邓、批“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回潮”、批“三枝大毒草”、批“天安门事件”，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反正上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都能事先从市里的会议上知道，再回厂回车间当传达员。当时市委写作班子经济组每周五召开工人理论队伍学习会议，对“上面”的精神扩散，我们便比一般干部知道得早些。我以消息灵通自居，厂里许多干部也经常到我这儿来打听消息。

其实我所知道的都是经过选择和扭曲了的信息。我处于帮派体系的网罩中，真

正的信息我却一点也不知道。那些当时人人皆知的小道消息：江青让美国人写《红都女皇》挨毛主席批评，王洪文被毛主席批评，毛一再叫不要搞“四人帮”等等，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再听到这些信息，简直大吃一惊。我的政治地位使得别人知道了什么也不敢告诉我。有一次，我们车间理论小组的一个工人向我透露了一点点关于江青的传闻，我立刻一本正经地叫他不要再讲。我的本意是不希望自己的同事以后被批判，但这样使我失去了信息来源。

每逢有什么风波，宣传机构总要我表态，写文章或拍照片登报。拍我正在学习的镜头，拍我在生产第一线与工人一起大批判的镜头。我的工种是浇钢，浇钢时钢花四溅，典型的炼钢工人，而钢铁工人又是典型的产业工人，拍出来的照片很好看。到后来，这种文章或照片不但是上面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成了我个人的需要。因为我如果有一个时期不上报，外面便会传说我犯了错误。我需要上报纸来消除这类传说。如江青被毛主席批判时，外面也传说我犯了错误，后来《文汇报》开了个座谈会，我参加并被拍了照片，上了报纸，谣言才消除。

现在回想起来，我搞的根本不是什么学问或研究，而是强词夺理，以势压人。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同伙按他们的政治需要定下调子，然后从我们的咀中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说出；基层干部也把我们作为他们加官进爵的资本。事实上，我们真正为市里或中央写文章的次数并不多，大多数文章或发言稿都是厂里要我们写的。厂里向上汇报或总结的工作成绩就是：全厂大批判专栏办了多少期，多少人写了文章多少篇，发言多少次。反正也不讲文章和发言的具体内容，哪怕抄一篇都可以，当然最好是抄外省市的报纸，不要抄上海的。这些干部为我们扶着向上爬的梯子，我们为他们制造向上升的资本，互相利用。文革结束后，这些干部批判我说是四人帮害了我，我心里却觉得同时也是他们害了我。

文革极左势力利用我们的方式是：

(一)“先学一步”。让我们参加中央和地方的一些会议，再通过我们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在基层宣传他们的思想。

(二)“培养提拔”。我们这些工人理论小组的青年，以后都当上了车间领导，最高的如我，当到车间党总支部书记，但还没有人当到厂一级的。我们大多分管理论学习，于是没事也要找点事做，跟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组织“工人理论队伍活动”。当然，做得越多，犯错误越多，文革结束后全被从领导职务上撤了下来。

(三)“报纸刊登”。我成了典型，尤其是当上四届人大代表后，极左派的宣传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的宣传，我被名声所累，一举一动都必须想着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唯恐紧跟不上形势，根本不敢有自己的思想。过去，看书、写文章对我是一种享受，后来却越来越成为负担，按题作文，以势压人，空话连篇，毫无价值。我完全成了筹码、工具。

就这样，我们号称工人阶级，却离工人阶级的实际需要越来越远。首先是我们这些“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与一般工人的脱离。我们上班不干活，本来该我们干的一份活都由别人干了。炼钢是集体操作，少了一个人，原来五人的活四人干，三人的活二人干，那干活的四人、二人必然不高兴。炼钢又是苦活累活脏活，不干活简直是一种享受，所以许多人包括我都很愿意脱产，在第一线干活的工人自然对我们有意见。其次是工人理论队伍内部的矛盾。随着工人理论队伍的走红，尤其是上钢五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小组更是工人理论队伍的典型，许多人被调去市委写作班或其他市级局级机构，彻底脱离了繁重的炼钢工作，留在厂里的理论组成员便有意见，因为他们虽然能经常不干活，但毕竟不能长期脱离生产第一线。此外，我们这些御用的工人理论队伍与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理论队伍成员也有矛盾。一些青年工人被学理论的口号激发，组织起来学习，而一旦他们真正以自己的头脑去学习时，便能发现那些被官方称为真理的理论的荒谬。有个外地工人给《红旗》杂志和上

海市委写信说“批唯生产力论”是错误的，不符合经济规律。写作班子将信转给了我们，我们将这个工人的观点作为例子，在报上写文章批判说工人理论队伍如不加强学习，就会走向反面。

而事实上，我们的理论根本不能代表工人的观点，我们批“资产阶级法权”，二车间的一个工人理论队伍成员甚至喊“三十六元万岁”，这句话马上被徐景贤利用。文革前上海工人的起点工资是四十二元，文革中降到三十六元，我们进厂满师后的工资都只有三十六元，而且好几年不加工资。工人是希望增加工资的，我们却说三十六元是破“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要“万岁”，现在想来真是荒唐。工人理论队伍发表的许多诸如此类的观点是违背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的。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学习理论，是在捍卫真理，直到文革结束后，我被别人批判时，才发现自己过去的荒谬。我过去对别人以势压人，动不动就给别人无限上纲，现在别人也用同样的方法批判我。过去和我一起的工人理论队伍成员，除了一人外，都“反戈一击”批判我，我成了孤家寡人。我过去怎么批判别人，别人现在也怎么批判我，思路、方法和推理手段完全一样。我这时才体会到过去我对别人的批判是多么的蛮横。二车间过去是理论小组头号典型，作为负责人的我自然成了头号批判对象。我曾经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都被翻了出来被批判，我过去又特别喜欢写得生动，写得别具一格，于是就更容易被记住，被揭发。我前后写的文章、发言稿共七十篇左右，数量最多，自然可供批判之处也最多。我被“隔离审查”关在厂里五个多月，从夏天关到冬天，对我的大型批斗会开了三次，检查书写了十万字。揭发我的多是那些过去工人理论队伍的积极分子。倒是那些以前曾被我批斗过的人毫无报复心，还很同情我，因为他们有过同样的经历。

当我发现别人批判我的方法与我过去批判别人的方法一样的时候，我心里反而平静了，我明白这是时代的产物。我被发配回浇钢工段，与刑满释放者在一起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最后，与我同年进厂的同龄人都因年岁渐长而陆续调到轻体力工种去了，只有我还在重体力的第一线干活。没人来开导我，没人来找我谈心。但是我反而觉得这才是真正回到我本来的位置。过去我最红的时候，说的和写的都不是我自己的思想，还时刻要维护我被别人树起来的工人阶级理论骨干形象。厂里也把我作为重要人物，专门给我一间房间，吃、睡、写都在里面。我被保护起来，关在这间屋子里专门写文章，不接见外人，而由专人接见一批又一批的“取经者”，由专人为他们作各种各样的报告。最后，连我父亲都到我们厂来“取经”。而现在，我终于空闲了，终于能看我自己想看的東西了。我又重新看书，看毛主席的书，看其他政治书。过去是为了写大批判文章不得不看，现在是我自己要看的，读书对我重新又成了享受。我读了中国二十四史，国际政治史，西方政治史等，我可以好好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一九八零年以后，我开始学习外语，因为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文革中的红人，文革后又受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被作“犯严重政治错误”结论，再向社会科学方向发展没人会用我，我就自学德语，后来又学日语，最后学英语。我没能上大学，厂里不让我去考，连业余大学都不准我去考。我只好去考自学考试，因为只有自学考试可以不要单位的介绍信。可每次我自己觉得考得不错，而考分却总是不及格，比我学得差的人却能及格。我真怀疑我的考分是被有意评低的。所以我终于没能圆成我自小的大学梦。不过由于我坚持自学外语而且学得较好，厂里后来终于让我从事技术翻译，直到现在。

□ 原载《新世纪》1998年8月

~~~~~

【研究报告】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二）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续上期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 ◇ 一．悖论：文化大革命对异端思潮的造就

历史的发展真是充满着悖论，由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带有宗教性狂热的动乱来充当异端思潮的母体，这本身就向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饶有兴趣的问题。例如，文革作为毛泽东的权力角逐和在全国建立他个人绝对权威及专政的手段，为什么反而促成了异端思潮相当规模的产生？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究竟在哪些形式与内容上提供了异端思潮的催生剂？又如，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段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时代，毛泽东与中共已在十七年中建立了一个极端封闭、专制乃至凝固的思想环境。与五四拥抱与迎接西方民主思潮的开放胸襟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把人类所有的进步思想都置于“横扫”之列，即便是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不同思潮流派，也都列入了“修正主义”的另册。那么，那些异端思潮又从哪里汲取了它们赖以孕育与发生的思想营养？再如，文革中骚动不安的异端思潮，大都打着诠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有的甚至比毛在当时的思想更为极“左”。浮面看去，它们大多没有挣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樊篱，为什么竟成了后文革时期民主主义思潮的滥觞？而他们中的不少活跃分子，最后百川归海般地成了民主战士？看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这样的复杂课题，是无法用“彻底否定”的方法一言以蔽之的，必须认真地探究其更深刻的历史动因。

早就有人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象《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一百另八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了。”〔2〕这一生动的比喻至少可引申出以下两层耐人寻味的意蕴：其一，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特定形式本身——“社会主义大民主”（即一度写入中共宪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一种有益于异端思潮产生的形式。其二，这对于发动者毛泽东本人来讲，是无意的，或事与愿违的。

确实，作为中共社会主义制度缔造者与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至秋冬之交的文革发动期中，奇迹般地跳到这一制度外来抨击这个他所缔造的党和制度，甚至号召群众猛烈地冲击和批判之。然而，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批判这一社会制度？是因为这个党的专制，这个社会的集权与广大人民群众发生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因而使他不满意吗？不，完全相反，是因为他仍嫌这个国家和这个党还不够集权，还不够专制，党内还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还旁落在他人的手里，因而他要冲击它，粉碎它，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显而易见，毛泽东要打的是一场完全逸出常规的战争，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构，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征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取非常特殊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

任何一种政治运动的形式一旦产生，便立刻有了它本身的意味。尤其对一场千百万人投入的群众运动来说，再严密的中央集权都是难以控制的，更何况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正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全部组织根基——随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党组织在群众运动冲击下的全面瘫痪，毛泽东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控制不了用他自己的符咒所唤出的魔鬼了。简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式至少在以下三点上突破了社



会主义制度的传统与常规，有利于异端的孕育和产生。首先，它给了群众以“四大”的形式去揭发、批判和斗争除了毛泽东的司令部（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一切党组织的权利，上至中央副主席，下至一个车间支部书记；而文革前十七年哪怕向一个党员提一丁点儿意见都可能被认为是十恶不赦而“运交华盖”。这一形式解放了民众的为十七年的专制所囚禁的思想，更有利于他们的独立思考。如同“李一哲大字报”作者之一的王希哲在他那篇著名的长论《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里总结的：

“毛泽东为了打垮党内民主改革派（指刘少奇等人——引者注），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3】

美国学者梅尔·哥德曼（Merle Goldman）则从另外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党的官员和学生来说，‘文革’间接的后果是他们意识到，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在‘文革’仍然进行之时，‘文革’这一代人就已不断显示出其独立性。尽管那时派性斗争激烈，形势一片混乱；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是因为派性斗争和形势混乱，才使得控制变松，触发了种种独立思考和行动。而这一情景在‘文革’前当党领导着生活中几乎所有的领域时，则是不可能发生的。”【4】

第二，文革中的群众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结社自由，而文革前除中共领导的组织外，任何一个自治的群众组织都可能被视为“反动组织”而立即取缔。自“清华附中红卫兵”以来的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群众组织，如果都作为一种“社团”或“准社团”来看的话，就其巨大的数量而言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由于结社，产生了派性，继而是某种权利及保卫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而群众只要有了组织，便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最后便会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而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文革中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由于某一群众组织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不和而遭到镇压，强烈的结社意识使这一派的群众奋起保卫他们的组织权利；或转入地下，或成立变相的组织。从而，这成了他们成为自觉的异端的开始。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二次炮打张春桥的事例。如果说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后的第一次炮打是因为他们与张春桥关于夺权的意见不合，那么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第二次炮打就带着耀眼的反迫害、反镇压的民主色彩。最后，他们中出现了“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中串会”那样的异端思潮组织。又如湖南的“湘江风雷”，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中被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派镇压。但已经有了政治派别意识的湖南造反群众激烈反抗。不但被捕的绝食抗议，同一组织的监外成员又改头换面，重整旗鼓继续活动，最后由于党内权力斗争的缝隙，“湘江风雷”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获平反。平反后，“湘江风雷”内即分裂出了“省无联”这样的异端思潮组织。

第三，文革中报禁有某种程度的开放。自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夏，群众组织，尤其是青年学生组织办报办刊风行全国，这恐怕也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观。尽管大多数群众报刊千人一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也有不少成为民主思想和新思潮的重要阵地。曾刊载遇罗克《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便是一例。遇罗克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先知先觉，早在毛泽东批吴晗和“海瑞罢官”时，他便给上海《

解放日报》、《文汇报》及《红旗》杂志投稿反驳。但由于当时报禁未开，他的文章除了一小块得以刊出外，均被退了回来。他的〈出身论〉，原来也是一份自刻自印的油印传单，一贯反对“血统论”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极偶然中看到了电线杆上的张贴稿。起初牟志京只是想把它变成一份铅印传单，结果在排版时因为字数不够，有很大空白，经排版工人提醒，牟当场决定办成一份报纸，并取了一个响亮的“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作为主办单位〔5〕——这样，〈出身论〉这样一份黑暗中的中国人权宣言书才正式上报，立即在全国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而在文革前十七年，是绝不可能想象牟志京、遇罗克这样的普通青年可以如此轻易地办起一份宣传异端思潮的报纸的。

对于异端思潮的流行来说，仅有运动形式上的有利而无运动内容上的有用之处，它们仍不能流行起来。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异端思潮——从〈出身论〉到“省无联”——大都孕育和产生于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之中。注意到这一事实，便应当研究一下这一为毛泽东所号召的群众性的造反运动的发端，是否也带有相当的民主性或人民性？答案是肯定的。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打成反革命”等手段迫害了无数政治异己与对他们不满的群众，至文革爆发，中国社会已蕴积了一个巨大的反迫害资源。文革初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官僚阶层，为在与毛的权力斗争中保全自己，不惜牺牲无辜的人民群众。一方面，它们试图把毛点起的文化大革命大火烧向群众，以“反右斗争”的传统方式在全国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大抓“反革命”；另一方面，它们利用它们子弟组织的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以横扫“四旧”与“黑七类”为名，残害无辜的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二千多教职工，家在北京的便有一百多人被抄家。“从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6〕，显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是打倒他的党内政敌而不仅仅是破“四旧”与反“右”派。虽然他对于这些被残害的无辜群众也毫无怜惜之心，但他意识到他可以打一张民意牌、人权牌，以反迫害作为号召——那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省无联思潮”的代表人物杨曦光在一篇化名为“习广”的纪念文革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

“毛泽东号召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其号召的核心当然是人权问题。十七年来，每次运动总是用打反革命等残酷的迫害手段来对待政治异己，反迫害和平反的口号无疑是真正能号召人民的。从此，毛泽东开始重新抓到了民心的脉搏。他的成功之处并不是单纯左的经济路线，而是同时也配合了一个打人权问题牌这种右的策略。至于究竟是毛泽东利用市民运动来搞宫廷斗争，还是市民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也值得史学家去重新研究的问题。”〔7〕

另一位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李一哲”之一的王希哲，则早在一九八〇年便提出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便是可取的了。”〔8〕这一说法后来又被八九民运的领导者之一的中国作家郑义深化为“两个文革”的理论：

“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这是一个利用群众运动冲垮共产党各级机构，从而打倒政敌，以夺回失去权力的高级权力斗争；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则是一个利用皇帝（虽远非自觉）来打倒贪官污吏的民主斗争……虽然文革口号纷杂，目的含混复杂，但反抗暴政却是波澜壮阔，势不可挡的根本的动因；”“本来，历经两千年君主专制残酷塑造的中国人民是绝不敢轻言造反的。毛的号召，使一切造反行径名正言顺，现在不反，更待何时？这一下，平日逆来顺受的人民便如火山爆发一般喷射出仇恨的岩浆。毛和人民同时找到了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

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林彪九大报告）。这就是毛的权力斗争和民众的民主斗争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9】

尽管对于“批判资反路线”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造反运动是否已是一场“民主斗争”可再作探究，但它带有广泛的人民性应有定论。这一点，国内的研究者亦有同感：“平反在政治层面上动员了与当权派有矛盾的群众，批判血统论则在社会层面上发动了更多的群众……由于资反路线是通过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贯彻的，各级领导几乎人人有份。因此，批判资反路线带有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群体冲突的色彩。不仅如此，批判资反路线提供了一个群众发泄对领导不满的机会。长期积累而不能不宣泄的不满、怨恨藉此机会表达，从而使对当权派的批判一发不可收拾。”【10】不管毛泽东是出于什么个人权欲的目的而打了这张反迫害的民意牌，也不管当时的造反运动是否自觉地利用了毛泽东的口号，当时的运动走向对于异端思潮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千古难期的催生机会。这一点，无论是当年异端思潮的代表人物，还是国内审慎的文革史研究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大体相同的肯定。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正面地探讨一下异端思潮在文革中产生的思想条件了。如同物理学中力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会伴生反动的附衍物，任何一次反动也会产生革命的副产品。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旨在消灭全民族的任何独立思考（用张春桥的话来说，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建立他一个人的思想统治与精神奴役的一种手段。历史的逻辑却朝“伟大领袖”意愿的相反方面走去，异端思潮就迭起在文革之中，思考的一代的崛起正是文革最积极的副产品。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究细察一下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何以会成为哺育它们的那种制度，那个社会的异端，更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是初源于那种制度，那个社会本身以及作为它们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巨大矛盾性，这一矛盾性首先表现在作为毛泽东指导文革的那个理论体系，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完全服从于毛泽东权力斗争需要的庸俗性。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文革的目的明明是消灭所有独立思考，但为了炮打刘邓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一再公开号召和鼓励青年人“独立思考”。毛泽东是中共集权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缔造者，他决不讨厌这一制度，但为了发动群众帮助他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他一再发表言论抨击这一官僚制度，给群众造成他是民主的代言人的错觉。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决不是“血统论”的反对者，但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在六六年底的“批判资反路线”中却号召全国群众批判“血统论”。对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来说，这并不奇怪，在为自己和他们那个集团争夺权力时，他们总要隐瞒自己的私利，而把社会的公利写在欺骗民众的旗帜上。与翻云覆雨，言行不一的政治老手毛泽东等人不同，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一代是虔诚的、纯真的、执着的。他们在文革中很快便汲取了、抓住了、继而是延伸了毛泽东等人那些不论是出自什么目的而讲的颇具民主色彩的言论，合理地推导出了颇具独立性的理论体系——异端思潮便由此应运而生。其二，毛泽东思想自身的矛盾性还表现为它在文革实践中的反复无常性和为了权力斗争而牺牲人民群众的残忍性。如果说毛泽东等人为利用群众作为他们党内大清洗工具时颇带民主色彩的言论激发了异端的产生，那么一旦完成大清洗后，他们翻手为云地镇压人民群众，覆手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专政便使群众对他的幻想迅速破灭，从而产生怀疑和觉醒。遇罗克和他的《出身论》的经历，可算一个例子。《出身论》是作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对立物，是在1966年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产生的。当时，毛泽东及其中央文革小组已看到“血统论”成了他们的政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用以与他们抗争的有力政治工具，因而，他们声色俱厉地斥责“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陈伯达）【11】。虽然由于遇罗克的先知先觉，《出身论》初稿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7月。但它仍修改并正式出版于“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

。在《出身论》及其他文章里，遇罗克有意无意地大量引用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言论，应当说仍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权宣言。据当时《中学文革报》的实际主编牟志京回忆：《出身论》刚发表时还曾有过二位自称《红旗》杂志、中央派来的记者来过，对他们讲“中央非常重视你们”云云。对于这群坚信“不同出身的青年应有平等的政治待遇”的青年人来说，一直虔诚地相信他们会得到中央表态支持。然而《中学文革报》出到第三期（1967年2月），已传来中央文革（关锋）讲他们“大方向错了”的指示，四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更变本加厉地把《出身论》说成是“大毒草”。〔12〕不久《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遇罗克身系囹圄。如果我们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上层权力斗争的视角来看中央文革态度的剧变，便不难理解其中的一点奥秘。尽管平等与人权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心中不过是一出蒙骗愚民的把戏，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他们仍需要《出身论》这样的力作去发动群众。到了“一月革命”之际，遇罗克们非但没有象大多数造反派那样由对他们的感激涕零而充当夺权的打手，反而更为认真地研究起社会平等与人权问题来，自然是“大方向错了”。至于到了四月间，毛泽东为了玩弄权力平衡，减缓军方及周恩来为代表的官僚阶层的压力，下令释放了“血统论”的代表者“联动”分子，自然本来就不是他们一路思维的“出身论”要被批判为“大毒草”了。尽管遇罗克被捕，报纸被停，但对他的战友们来说，“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感到整个信仰的基石崩塌下去”〔13〕——这一崩塌的信仰的基石，当然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异端思潮的产生、发展与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民主”的欺骗、玩弄的关系，。1968年出现的“省无联思潮”对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的执着应当说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新政体，原来是毛泽东最早鼓吹的。他声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和“北京公社宣言”。在他与刘少奇决战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又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十六条告诉人民：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14〕关于这一民主政体形式，林彪最早作出过详尽解释：“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5〕——对于深受中央集权专制之苦，而只知道巴黎公社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民主政体的中国百姓来说，毛泽东冠冕堂皇的许诺打开了一幅何等鼓舞人心的民主前景。当“一月夺权”在上海实行之际（1967年2月5日），上海的造反群众天真地把上述最高指示写进了公社成立宣言：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了的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全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16〕

不料，这却引起了“叶公好龙”的毛泽东大惊失色的反对：“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毛甚至公开贬低他一贯倡导的公社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不久，毛又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17〕——一言道破天机，原来毛泽东的巴黎公社的全民选举的民主新政体，不过是他翻云覆雨的

袖里乾坤。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来讲，核心永远是一个“权”字，而不是什么革命理论。只要他们清除了党内异己，夺回了旁落的大权，他们想到的便是立刻恢复他们那集权专制的党，并使之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法西斯化。于是，“上海人民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的原则顷刻间变成了故纸堆里的垃圾。

然而，在长沙（“省无联”），在武汉（“北决扬”），在广州（“八五”公社），在山东（“渤海战团”），在上海（“炮司”，“中串会”，“反复辟学会”），在北京（“北师大造反兵团”）却有那么一批独立思考的青年人，仍执着地要实现毛在文革初期所作出的“新政体”的许诺，这便是自1967年夏到1968年春被称之为“极左思潮”的“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特点，香港学者赵聪在他总结文革的三卷本巨著《文革运动历程述略》里有着大致不差的概括：

“他们死抓住毛泽东在文革初发出的号召不放，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党组织，重新造党，而不是什么恢复和整顿；坚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十七年来新形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而不是个别地罢官和揪斗；坚持把政权机构交由人民大众来掌权，组织人民公社，而不是起用旧干部组织三结合的革委会；坚持人民武力缴还人民，要在军中搞文革，而不是军队与人民对立，进行三支两军的工作。总之，他们主张要把文革进行到底，不能后退，也不能停顿。虽然这些文件并不公然反毛，但却暴露出毛的言行前后不一致，也无形中拆穿了毛实为打倒刘邓一系而佯言进行文革的骗局。文件只是对周恩来一系官僚猛轰，对林彪、江青的讲话指示反而极力称赞，焉知不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所以虽然他们某些极左的主张如文攻武卫等与江青所喊的口号相同，而冲击军区和抢枪行动又与五·一六兵团无异，可是中央文革终于嗅出了他们要向毛林集团造反的味道……”【18】

一言以蔽之，这些“新思潮”之“新”之处，其实正是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带有民主色彩许诺（理论）的逻辑推理与发展而已，而这些“新思潮”之所以都遭到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残酷镇压，也正在于他们把毛泽东等人的“此一时”的许诺在“彼一时”当真要求兑现，结果便龙颜不悦，恼羞成怒，自然要对他们斩尽杀绝了。

异端思潮初露于文革中的第二个思想条件，源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信条之间的矛盾。对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是正确与否，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在文革中宣扬的东西都是一种它的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变异。然而，他们都偏偏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要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这样，马列主义的著作成了文革中广大青年唯一可以合法学习、汲取的，除毛泽东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资源。尽管文革中的异端思潮并没有达到很高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仅这些青年人在政治动荡中接触的有限的马列主义著作，便已使他们发现了差异、鸿沟与矛盾。作为一种“不幸”的结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说竟成了这些异端思潮的倡导者用于批判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思想武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以及依据它的体系而推导出的某些立论成了异端思潮的化身——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些讽刺性的悖论。例如，“省无联”们要求推翻新的特权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时，用的是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与列宁关于“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分析。又如“李一哲”们呼唤民主与法制时，用了不少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的论述。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还是伊林·涤西反对个人迷信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青年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用笔名在清华园内贴出了这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因它在当天下午即被撕毁，他们又于11月18日印成传单广为散发。1966年夏秋之际，正是毛泽东通过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之际。伊林·涤西的信中批驳了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

出现一个”的吹捧，对林彪讲话中的“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本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提出这些批评时，异端思潮的主要立论竟来自斯大林在《论反对派》中提出的不应当说列宁比马克思高出一筹的论述，他们的结论是：“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搞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19】事实上，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所谓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之间，常常厚“马”非“毛”。“省无联”骨干之一周国辉就曾到处扬言：“毛泽东思想除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外，其他都是很陈旧，很落后的。”【20】遇罗克对毛泽东思想也一直不以为然，他除了在“文革”一开始就批评大搞个人迷信的种种做法外，直到狱中还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混乱的，他曾对狱友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21】

异端思潮在文革中初露的第三个思想条件，发轫于中共长期以来鼓吹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的虚伪性，它与社会实际的矛盾性，以及文革中公开暴露的上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极端无原则性。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文革中一再打着“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旗号，他们的原意自然是让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到他们的旗帜下来。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成了一场毛泽东思想的大幻灭与人民觉醒的大教育。文革使青年一代看到了太多的打着“马列主义”幌子的黑暗的权力斗争，结果使许多原来忠心耿耿支持这一制度的青年人都开始离经叛道，“血统论”便是一例。“血统论”一开始并不是异端思潮，相反正是建国十七年来已经执行的所谓“阶级路线”。这一路线以家庭成份、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将阶级成份的划分永久化，人为地造成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对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来说，“血统论”是维护和巩固发展其特殊的政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依据。应当说，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浓厚封建色彩的政党来说，与历代帝王所公开标示的世袭制一样，这正是他们“阶级路线”的真谛。本来，如果中共开诚布公地宣布要搞荫封制，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的三纲五常，官尊民卑，皇权至上，长幼有序等正统观念一样，倒反而有法可依，至少有搞特权的规则可循。然而，中共一向以不谋一党之私昭示天下，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便使他们不得不虚假地提出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进行欺骗，来平泄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但这样对于干部子弟来说，他们的世袭特权便既没有了理论保障又没有了民意基础。对于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要求垄断“接革命班”权利的一批幼稚狂热的中学干部子弟来说，自然不懂和不满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虚伪性和策略性，他们急于要把政治的不平等公开化与永久化，以确保自己在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权利分配。老红卫兵以及作为它特有意识形态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说穿了，它不过是中共所谓阶级路线的不聪明的公开版而已。这也是在“对联”刚出笼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对它以及它所造成的“红色恐怖”在相当一段时间取纵容姑息态度的内在原因——他们在骨子里原是一致的。但当“血统论”成为这些老红卫兵保爹保妈的政治斗争工具，他们本身也成为刘邓在与毛的权力斗争中一支别动队时，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才声色俱厉地将之宣判为异端思潮。而毛泽东及文革派对这批老红卫兵的始利用后抛弃也激起了巨大的反弹，这些自持血统高贵，一向傲气十足的干部子弟于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继续以“血统论”为思想组织基础，要求“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22】等等。与“省无联”等极左派的“新思潮”相比，联动思潮的价值取向是朝后的，即要求回到十七年的中共专制；它的打击面是朝下的，即所谓“地、富、反、坏、右”及“蒋介石分子”。但不管怎样，它仍表达了一大批青年人在其亲身经历的教训中萌发的对文革的不满与对毛泽东及其追

随者的批判。又由于这批干部子弟所处的特殊阶层的地位，他们不仅深切体会到中共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接触到中共政治斗争的黑暗性和无原则性，他们中最终杀出了魏京生等整整一批这一制度营垒内的反叛者，而且他们的叛逆姿态还往往比较“左”派群众更为激烈，更为公开。

“文革”将中共已延续了十七年的体制和思想发展到极致，并以一种赤裸裸的残酷表现了它的实质。事实上，由于中共上层权力斗争黑暗面在文革中的大暴露，不仅使干部子弟，而且使一大批在运动一开始因个人迷信而卷入运动的普通青年冷静下来，产生普遍的“幻灭感”，这又是“逍遥派”的主要来源之一。又由于动乱所造成的缝隙和某种相对的自由，这些青年人看了不少在当时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书，并结社研究“真正的马列”。六七年底北京大学何维凌、王彦、胡定国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便是这样一个异端组织。只要看一下当时他们所潜心阅读、热烈讨论的部分“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的书单——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吉拉斯《新阶级》，爱伦堡《人，岁月，生活》，尼采《扎拉查斯特如是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思路会终于冲破旧教育所框定的牢笼而走向自由的异端。〔23〕在另一方面，上层权力斗争的肮脏性和无原则性在文革中的一览无遗甚至使追随他们的造反派组织都产生了始而离心离德继而群起仿效的倾向。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原是文革派的嫡系造反派组织之一，然而据史记载：

“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不久，兵团更加执着于在清华园外抢权、夺权。兵团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主义倾向一发难于收拾。自1967年初至1968年7月，兵团内就不断出现咒骂周恩来，怀疑康生，批评中央文革，否定陈伯达，斥责江青，抨击谢富治，甚至对毛泽东、林彪本人也有所‘不敬’的事例。兵团内的许多人实际上以知识分子狂热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置身于文革的洪流中……对对手无所不用其极的举措，而自身既有文过饰非，言行不一的劣根，也有惟我独尊、唯我独革的恶习，更有追逐功名、嗜权如命的丑态……。”〔24〕

早就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诙谐而又适当地比作“比赛革命的革命”和“革革过命的人的革命”，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它无规则的斗争的循环性与伤害的普遍性。如果说运动初期是干部及干部子女反“右”——革下层群众的命，那么“批资反路线”又是下层群众起来造反革干部及其子女的命（他们的前任革命者）；接着军队又借所谓“二月逆流”革造反派的命（他们的前任革命者），再下来是干部（官僚阶层）与群众（造反派）联合起来革军队（林彪）的命……如此循环不已，永远是无休止的冤冤相报，永远是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直至八十年代，还有所谓“清查三种人”……革前面所有革别人命成功和失败的造反者的命的后补“革命”。文革的最大缺点同时又是最大优点之一正是革了所有人（从“国家主席”到“地富反坏右”）的命。创巨痛深之余，所有的人对这种“革命”产生了幻灭感，产生了“三信”危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这便给异端思潮在民众心田里的滋生、繁殖提供了广阔的天然土壤与养分。

注释：

〔2〕汪《李一哲给后来人的几点启示》，纽约：《中国之春》，1983年3月。

〔3〕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革命》，香港：《时代》，1981年2月。

〔4〕梅尔·哥德曼《文化大革命的非消极影响》，纽约：《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

〔5〕谷丁《一个人的文革史》（上）（中）（下），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3，2/19；3/19；4/2。

〔6〕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8页。



【7】习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中国之春》，1986年春季号。

【8】同【3】。

【9】郑义《红色纪念碑》，台北：华视文化公司，1994，第181页。

【10】印红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运动的兴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

【11】陈伯达〈对两个月来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一九六六年十月），载《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9年，第302页。

【12】同【5】。

【13】同【5】。

【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载《人民日报》1966/8/9。（见本刊zk9608a——编注）

【15】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3日。

【16】转引自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原载广州《人民之声》特刊二期。

【17】《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第667页。

【18】赵聪《文革运动历程述略》，香港：友联研究所，1971年，第二卷，第352页。

【19】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日），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20】见〈康生同志谈省无联（1967年1月24日）〉，载广州《八五》，1968年2月。

【21】张朗朗〈我与遇罗克在狱中〉，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7月。

【22】〈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中发秘字003〉，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23】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学社”及这一小圈子青年人的详细描述，见潘婧〈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载纽约《北京之春》，1995年1月。

【24】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见本刊zk9607b——编注）

（未完待续）

~~~~~  
【读者回响】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对《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的质疑

• 直 言 •

读完贵刊增刊第156期（zk9809a）上朱建国著文《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一文（原载于《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作为对张志新其人有相当了解的一名华夏文摘的忠实读者，我感到有必要就我所知对文章作些质疑，以正视听。

看完《张》文，我心中充满悲愤。文中寥寥几处的真实描述，迫使我这个在北美生活了多年的人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其实并不遥远的时空。烈士所受到的非人待遇，说明了中国需要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性。而烈士在强暴与凌辱面前自始至终所表现的深刻思想，独立思考与特立独行的大智大勇体现了真正的超越于时代局限的人文精神。

看完《张》文，我的反应十分复杂。凭心而论，我不喜欢《张》文在于其文在

复还人性的宣称下，表现出利用烈士的私人生活来满足某些猎奇、窥密心理，哗众取宠、以获取轰动效用的浅薄与媚俗性，是对个人隐私权的粗暴践踏。然而我个人并不会在乎这样的文字，只要它们是基于事实的。

但是，可悲的是，文章所披露的主要事实是被严重扭曲、似是而非的，并经海内外媒体的传播而成谬误。首先，文中所提到的烈士自己就生活作风问题所作的检讨材料的实际背景为：志新的丈夫发现了志新所保留的一名男子的信，并视其为所谓非正当关系的证据，致使整个事情扩大化，后来志新为此在组织生活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与检讨，并留存档案。

其次，朱文断章取义地引用志新在狱中给家人的信中字句“我对不起你”作为支持其论点的证据也给读者以极大的误导。为此，我不得不就此信原文多言几句。此句源于志新于1969年1月5日写给丈夫的信的第二段的结束语（见注1）。信中，志新宣称：一个人，无论生死，将通过投身革命事业而发现生命的意义。她已决心要为革命，为美好的未来献出一切、面对一切。信中开头，志新勇敢地做了自我批评，谈到她已无力尽家庭之责，请丈夫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们，尤其对逐渐长大的女儿要有耐心。她鼓励女儿“不要伤心，要坚强”，好好锻炼身体改正缺点，“好好照顾小弟弟”，称“妈妈对不起他们”等等。母爱之情跃于笔端。

第二段开头为“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一句意味深长的、饱含复杂情感的总结。随后，志新请她丈夫把她原准备为她父母送终的个人积蓄汇给她双亲，以给老母治病用，以最后一次尽孝，以及对照看抚养孩子的考虑，等等。最后志新写到“总之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对不起你”。

因此，首先，就原信而论，若非断章取义，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句引文的本来含义。其次，象很多才高志清的女子一样，张志新作为一名多情善感、才艺出众的漂亮女性，对生活与家庭有着很高的要求与期望。她极其看重家庭幸福与精神交流。而现实中，她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种种不堪回首的证据（包括上段中所引用的第二段开头语）都证实了这一点。我在此唯一愿举的事实为：他们夫妻间不断的争执与分歧一度使志新十分悲伤，不断的流泪甚至一度使她患了眼疾。而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离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我所知道的志新为人是敢于反抗任何强加于她的不公正待遇的。所以，即使有所谓的婚外恋之说，也只可能是她在感情上受到了严重伤害之后的抗争。绝笔不提这些背景，文章简单的将所谓“第三者”问题归为其夫“体弱多病”导致张的“性饥渴”，对当事人任何一方而言都是十分不当和荒唐的。因为这绝非如作者所想象的、今人们所理解的艳遇激情论，而只可能是一个个人、家庭与时代的充满心酸、无奈的悲剧。

而志新所信奉和实践的理想主义，她所拥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持独立思考的执著，使她超越了个人生活上的恩怨，而投身于对社会进步的关切和对理想和真理的捍卫。她为此承受了非人的残暴与凌虐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时过境迁，能够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人越发减少。烈士已矣，无法再为自己辩白。历史自有后人评说，仅仅是作为仍然在世的知情人，我愿为还原历史真相尽一己之力，遂拙文至此。

注1：张志新于1969年9月24日遭正式逮捕，此前已被拘留，失去人身自由。据说此信当时被看守所扣压，未能发出。冤案平反后，全文刊载于《中国妇女》1979年6月号第11页，并载于其它报刊杂志上。

□ 初草于1998年10月2日, 改于1998年10月18日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 (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赵 桦 (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 (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 (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 (美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 (美国)	cnd-cm@cnd.org

订阅 (或停订) 《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 (GB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 (HZ 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 (FTP): [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 (WWW): <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